

上海学

Journal of Shanghai Studies

第一辑



周 武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学

Shanghai

第一辑

周 武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学.第1辑/周武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2702-9

I. ①上… II. ①周… III. ①城市史-研究-上海市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3728 号

责任编辑 曹怡波
封面装帧 甘晓培

上 海 学

第一辑

周 武 主 编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4.75 插页 4 字数 424,000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702-9/K · 2307

定价 78.00 元

《上海学》集刊编委会

顾 问

马长林 王家范 冯绍霆 叶文心(美)

刘石吉(中国台湾) 安克强(法) 汤志钧 张忠民

张济顺 杨国强 沈祖炜 沈渭滨 苏基朗(中国香港)

周振鹤 罗苏文 胡志德(美) 高纲博文(日)

裴宜理(美)

编 委

马 军 王 健 冯志阳 叶 斌 江文君

张 剑 李志茗 沈 洁 邵 建 陈 同

周 武 施扣柱 段 炼 戴海斌

特邀编委

小浜正子(日) 王 多 王大学 包亚明 史通文(丹)

叶祝弟 刘士林 刘世军 孙安石(日) 毕克思(英)

邢建榕 张 宁(中国台湾) 张仲民 张利民 李长莉

杜 英 陈细晶(韩) 范 兵 段 钢 唐小兵

徐建刚 徐清泉 郭奇正(中国台湾) 高哲一(美)

屠启宇 萧小红(法) 萧 凌(美) 董建波 蒋 杰

黎志刚(澳) 戴鞍钢 魏定熙(美) 瞿 骏

主 编

周 武

主 办

上海社会科学院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团队

发刊词

周 武

开埠以来,上海一直备受世界关注,由这种关注而产生的有关上海的日记、书信、通讯、指南、游记、回忆录、论文集、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各类专门著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据 2009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上海研究书目》所列,截至 2005 年底,单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外文上海文献,以及部分海外驻国内机构出版的外文文献,即多达 4 092 种。就其趋势而言,近 30 多年来尤蔚为大观,举凡政党、帮会、同乡会,道台、警察、资本家、职员、文人、画家、记者、艺人、工人、女工、妓女、乞丐等等,靡不有专精的研究。这些论著几乎涵盖了上海的古今,尤以近代上海的研究最集中最深入,近年来更推而及于当代上海,有关论述渐成气候。

与国外相比,近年国内的上海研究更盛,大到多卷本的通史、通志、辞典,小到一所学校、一家影院、一个社区、一条街道、一幢建筑、一条河道、一本杂志,无不有专门的论著,有的还不止一本。譬如关于外滩源的研究,著作就不下 10 余种;写外滩、南京路、福州路、淮海路、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的书亦不少。至于各种影像、画册、地图、回忆录、口述史,更是铺天盖地,巨细靡遗。别的且不说,单是各类方志,据统计,截至 2004 年,1949 年后编写的新方志,即多达 1 034 种,加上最近十年新修方志,数量就更加惊人。如果编一本《国内上海研究书目》,那篇幅和规模绝不亚于《海外上海研究书目》。

以上还仅是上海历史层面的研究,若再纳入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艺学、考古与博物馆学、地理学、宗教学、建筑学、规划学、人类学、生态学、民俗学等具体学科切入的现实层面的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应用咨询研究和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以及各种蓝皮书和发展报告等,那就更不可计数了。正因为如此,有学者甚至断言:“上海学”已很难再有大的突破!

然而,检视这些论著,不难发现上海研究虽成就斐然,盛况空前,但毋庸讳

言,亦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据陋见所及,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一、描述多而解释少。如前所述,上海研究在中外学者的合力推动下,渐成显学,相关成果已极可观,但这些论著无论是史还是志,多仅止于描述,或记述上海的去,或分载它的自然和社会诸现象。描述,当然并不容易,但仅止于描述,就研究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毕竟罕有。如何在描述的基础上做出富有穿透力的解释,进而为都市研究提供一种分析典范,是更艰巨的任务,也更考验学者的智慧。解释不仅需要材料,需要理论,更需要拓展视野。墨菲说:“上海决不是孤立地存在;它同全国大多数地区和重要城镇息息相关;如果脱离了全国的历史、地理环境和发展演变,单就上海论上海,那么谁也无法把上海城市各时期发展演变的情况生动而逼真地描绘出来。”其实,上海不单“同全国大多数地区和重要城镇息息相关”,而且同整个东亚世界乃至全球网络息息相关。上海是一座“两个世界之间”的枢纽型城市,一头连着世界,一头连着广袤的内地,上海的重要性和“传奇性魅力”即是在这种联结中日益凸显出来,并成为中国迈向现代进程的肇始者和推进器。只有把它放到区域、国家和全球的视野中加以阐释,才有可能更准确地揭示出上海城市的变迁轨迹、动力机制和个性特质。

二、分门别类的研究多而通贯整体的研究却非常罕见。分门别类的研究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种常态,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各有各的视域、理路和方法,但相对于整体而言,由各社会科学具体学科切入的观察和研究,所能看到的和捕捉到的都只是局部的真相或某一特定方面的意义,并不足以说明一个社会或一个城市的“总相”。即使是各具体学科研究的结果之和,也不能说就是“社会的总相”(吕思勉语)。分科研究的这种内在局限在上海研究中不仅存在,近年受国际学术界大行其道的“从上到下”研究取向的影响,更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研究题目越来越微观,越来越细碎化。研究城市空间,则由城区、社区、街区延伸到弄堂、街道、广场;研究城市社群,则从道台、市长、警察、闻人、大亨一直到妓女、乞丐、流氓、混血儿;研究公共空间,则从茶楼、酒吧、咖啡馆、公园到浴室、旅馆、相亲角;研究娱乐文化,则从戏院、电影院到跑马厅、安恺第、百乐门、遛狗场、舞池;研究器物文化,则从自行车、照相机、电报、唱片到上水下水;研究教育,则从大学而中学而小学;研究卫生,则从公厕、马桶到粪便处理;研究社会,则从声色犬马、黄赌毒一直到吃喝拉撒,等等,无不有专人研究,专书出版。而那些真正影响上海城市变迁的重大课题,如战争如何塑造上海,上海如何由商业都市变成工业都市,空间如何变迁,文化与市场互动问题,中央与地方问题,省市行政疆界问题,上海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旧城改

造问题,郊区的都市化问题,生活成本问题,等等,反而很少有人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我并不是说上述具体的微观的题目不值得研究,或不必研究,而是担心如果缺乏通贯整体的视野,不具备起码的通识,把它们跟“城市的生命”、城市的内在需要、城市空间与功能的衍变连接起来,这样的微观叙事就会变成无法串起来的一地散碎,它的意义不免要大打折扣。

三、租界研究多而华界研究少。研究上海,租界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重大课题。上海从一个普通滨海县城一变而为国际性大都市,靠什么?靠的主要就是一整套迥异于帝制时代的新制度。正是靠这种制度,上海的地缘优势才得以充分释放出来,快速取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口岸,资本、信息、技术和人才的荟萃之地,进而一跃而为亚洲最繁盛的头号巨埠,足以与巴黎、伦敦、纽约媲美。可以说,制度变迁是近代上海乃至现当代上海变迁的内在风景,不研究上海租界制度,不研究上海的治理体系,就无法真正理解近现代上海城市变迁的内在奥秘。正因为如此,早期的上海研究即多从制度切入,如王揖唐《上海租界问题》、徐公肃的《上海公共租界制度》、阮笃成的《租界制度与上海公共租界》、蒯世勋的《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等皆是。最近30年来的研究,租界制度亦受到格外关注,由上海市档案馆主持编纂出版的《上海租界志》,马长林先生的《上海公共租界城市管理研究》和《上海的租界》,以及华东政法大学王立民先生主持的上海租界法制研究系列著作等,对租界制度的梳理和研究则更全面系统。不过,由于受语言和档案资料的限制,现有的租界研究多集中于公共租界,而法租界研究则相对较少,这种不平衡状况近年已引起学界注意,并有所改变。去年中法合作在上海召开了首届“法租界与近代上海”国际学术讨论会,即对近代上海的“法国区”及其治理体系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讨。相比之下,有关华界的研究不免瞠乎其后,迄今较具学术含量的论著仍不多见。实际上,这种研究格局不但影响近代上海研究的整体性,而且也影响租界研究应有的广度和深度,因为不深入研究华界,就无法透彻了解租界制度的集聚效应和外溢效应,更不足以说明近代上海城市变迁的“总相”。

四、有关变的研究多而有关常的研究少,有关变中之常和常中之变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西谚有言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上海从一个渔村变成区域性港市再变成国际都市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变是它的历史常态,没有变,就没有上海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开埠前上海地处江南边缘和大运河漕运体系的边缘,民情、风俗、习惯、信仰等俱受江南中心城市苏州和杭州影响,可以说是江南的上海。开埠以后,江南这种区域城市格局随着中外贸易体制的确立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上海与世界经济、文化的互动日益紧密,并在这种日益紧密的

互动中日趋现代化和国际化。据滨下武志、古田和子等学者的研究,早在 19 世纪后半期,中国商人已成功建立起以上海为中心、覆盖东亚甚至整个亚洲的商业网络(即所谓“上海网络”)和“交易圈”。甲午战争后,民间资本投资兴业解禁,在一派“商战”的呼声中,上海快速步入工业时代,沪东、沪北、沪西、沪南等都市工业区次第成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在此前累积的外贸、工业、制度和西学传播等方面优势的基础上,快速发展成为整个亚洲最繁华和最国际化的大都会,江南的上海遂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的上海。1949 年后随着国家政权的更迭,上海发展由“面向海外”转到“面向国内”,上海与世界的广泛联系被人为阻断,上海港口的远洋轮船几乎绝迹,外资企业、外国侨民纷纷撤离,“对于一个经济上紧密依靠经由海道畅通无阻地获取原料、生产和消费用品和市场的城市来说,这种形势不能不在基本上影响它的经济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发展不能不主要依靠国内的资源和国内的市场,世界的上海蜕变为中国的上海。改革开放后,特别是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上海再造通向世界之桥和通向历史之桥,重新接续传统,融入世界,上海由此进入“再全球化”的时代。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包括 1990 年 4 月浦东的开发开放,2001 年 10 月上海举办的 APEC 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0 年中国上海世博会,以及 2013 年 9 月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通过这些事件,上海不但成功重建了从商业到文化的全球网络,并在重建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转身,上海再度回归到世界的视线之内,成为全球瞩目的最具活力的国际大都市之一。从江南的上海到世界的上海,从世界的上海回到中国的上海,再从中国的上海到再全球化的上海,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赋予上海这座城市不同的内涵,这些来自不同阶段的内涵的不断沉淀和不断丰富,就构成了上海区别其他城市的城市基因、性格和传统,也就是上海城市的常。不妨说,常是根,是魂,是历史延续的稳定力量。但已有的研究中,比较关注上海的古今之变,而对常,即变如何沉淀而为常,以及变中之常和常中之变精微的细化研究则显然太少。

五、有形的研究多而无形的研究少。有形指的是上海的外在风景,看得见摸得着,无形指的是上海的内在风景,即传统、制度、技术、精神等。地理空间,城市景观,建筑、街区、街道、弄堂、广场、公园、邮局、百货公司、火车站,五花八门的组织机构,形形色色的人群,等等,都是上海的形,也可以说是上海的外在风景;而各种有形无形的法规制度,通过各种传媒出版表达的知识、观念、信仰、技艺,以及积久形成的各种约定俗成的“共同的习惯”、“公共信条”和“心灵积习”,则是这个城市的内在风景,是这个城市的神。中国有个成语叫“形神兼备”,但在具体研究中做到“形神兼备”是非常不容易的,往往是有形无神或有神

无形。这是长期以来将形的研究与神的研究分开的结果。形是神的载体,神是形的景深,单纯研究形,或单纯研究神,都不足以展现一个城市的形与神,只有透过一个个具体的形的研究,找到这个城市的内在风景,以及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以建筑为例,邬达克建筑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大获成功,就因为他独创的建筑语言,契合了“这个城市的命运”,邬达克的传记作者卢卡·彭切里尼认为,邬达克为上海的西方业主和中国业主设计作品的方向截然不同,而后者正是他成功的原因所在。“中国业主是手握权力的社会文化精英,需要用建筑表达自己的成功以及他们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雄心壮志。在这样的预设下,邬达克被要求寻找一种既能表达现代化又具有识别性的建筑语言,以区别于当时上海滩那些体现外国势力的强大与傲慢的建筑。”邬达克为自己找到了这种独创的建筑语言,“既能表达现代化又具有识别性”,正好契合了中国业主的追求。又如大上海建筑群,明显有别于外滩集中展示的欧式建筑群,它竭力表达的不是权力和财富,而是透过建筑向世界宣示中国政府在租界之外再造城市中心的雄心和理想。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大多相关的研究只关注有形的建筑本身,对建筑语言表达的意蕴、寄托和思想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实,一切人造物都可视为一种表达,建筑是一种表达,街道、广场也是一种表达,只不过表达的内容因人因事因物而异而已。

六、人文社会科学切入的研究多而科学技术切入的研究少。科学技术对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上海从一个滨海县城衍变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其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研发、创新与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转化、应用和推广。近代以来,上海不但是中国接触、介绍、传播、接受、消化西方科学技术最为集中的地方,而且是中国科学技术研发、转化和推广的中心。上海的现代性和优势地位的确立,很大程度即建立在全国领先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上海是中国最早引进、使用和推广电话、电报、电灯、汽车、自来水、煤气等公用设备和技术城市,在工业技术、建筑技术、工程技术、河道疏浚技术及通讯交通技术的引进与研发上,也都走在全国前列。上海的公用事业靠技术,制造业靠技术,甚至上海能够成为文化中心城市,也靠技术。如果没有与世界同步、全国领先的技术,特别是印刷技术,上海就不具备足以成为文化中心城市的文化生产能力和知识传播能力。可以说,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生活,也改变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对上海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城市变迁、市民社会生活变化的研究迄今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与人文社会科学切入的上海研究相比,科学技术切入的上海研究明显滞后。

七、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研究基本上处于一种割裂状态。长期以来,历史

的研究和现实的研究基本上是两拨人马,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几乎不碰现实,从事现实研究的学者更不愿回望历史,由此造成的割裂,以及由这种割裂造成的视域盲区,是已有的上海研究中最突出的通病。其实,现实上海是由历史上海演变而来,我们现在讲的“上海特点”、“海派”从哪里来?当然是由上海独特的身世和经历赋予的,不了解上海的历史,不了解上海历史潜在的种种可能性,怎么可能深入地理解上海的现实。简言之,没有历史感,哪来现实感。海外知名学者王国斌先生说得好:“当前时髦的关注点是地方与全球,很多学者试图从中抓住当代的情况,但我们应该记住历史的重要性。一些重要的历史变革模式不仅发生在地方和全球层面,也发生于地区和国家层面。无论我们是希望创造上海的未来,还是仅仅想观察和预测其可能性,更认真地研究历史将被证明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历史不仅教给我们问题,也告诉我们可能性”。上海学当然关注当代上海,但当代上海是由历史上海演变而来,不了解“源”就无法真正了解“流”,因此,在讨论和研究当代上海问题的时候,若不更自觉地赋予历史眼光,这样的讨论和研究便没有纵深的历史感。而缺乏纵深的历史感,再看似天衣无缝的解释也势必要减损其应有的笼罩力和说服力。

基于对上海研究现状的上述梳理与分析,我们希望这本以上海学命名的学术集刊,更多地从通贯整体的角度来解读上海,诠释上海,并藉此提升上海研究的立意、格局和气象。

追求通贯整体的诠释,并不是说可以忽视或不要细节、局部、碎片的研究,只是强调任何细节、局部、碎片的研究,都必须依托通贯整体的研究。钱穆在《晚学盲言》的开篇对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所作的阐释,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他说:“有‘整体’,有‘部分’。但应先有了整体,才始有部分;并不是先有了部分,乃始合成为整体。如先有了‘天’,乃始有春、夏、秋、冬,非是先有了春、夏、秋、冬,乃始合成一‘天’。亦是先有了‘地’,乃有山、海、川、谷,非由山、海、川、谷,合成一‘地’。一个住宅,必有门、墙、窗、户。非由门、墙、窗、户,拼凑成一宅。人体亦先由身之整体来产生出耳、目、口、鼻、胸、腹、手、足各部分,非是由各部分拼凑成身体。”钱先生的这段话让我想起多年前跟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一次交谈的情景。在那次交谈中,我偶然提到一个成语,一叶知秋,他马上接着说:如果你不知道秋天,一片落叶有什么意义!只有你懂得秋天,或对秋天有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才可能理解一片落叶的意义。我想,钱穆先生和孔飞力先生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细节、局部、碎片,只有在整体中,它的意义才会显现出来。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该不该研究细节、局部、碎片,而在于是否具备通贯整体的眼光和视野。这种眼光和视野,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通识。而通识,说到

底,乃是来自历史自身的“问题意识”,是思想与学术交汇的产物。它是一种视野,更是一种智慧。这种视野和智慧,既不是从概念推论的“纯思的抽象”中得来,也不是从纪实与虚构的“具象的抽象”中得来,而是从古今中外之变的洞察与思考中浮现出来的,当然还有学者本人的禀赋。

有人批评以往的研究过于集中在上层、国家、政府、政治、精英这些方面,过于突出精英,而对大众,对日常生活视而不见。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也不尽然。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一样,上层、国家、政府、政治、精英这些方面在历史变迁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他们构成叙事的中心,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和研究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他们的角色和作用,他们的重要性,不是来自上帝的授予或某种神奇力量的赐予,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是在大众中产生的。没有大众,何来上层何来精英?没有大众,他们的角色、作用和重要性便无从体现。他们的角色和作用,他们的重要性产生之后,又是怎样作用于大众,并影响甚至左右历史的。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孤立于大众之外的精英,也没有与底层、基层完全脱节的所谓上层。因此,宏大叙事的问题并不是出在过于集中关注上层、国家、政府、政治、精英,而出在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质疑的不是关注本身,而是以什么样的视野去关注。

上海学并不是今天才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概念,早在1980年,江闻道先生就已提出过这个概念,只不过他基本上把上海学等同于上海史。1986年,陈旭麓先生曾撰写并发表《上海学刍议》一文,不仅倡导上海学研究,而且对上海学这个概念做出了清晰精确的界定,文中写道:“上海学当然是以研究上海为对象,但它不同于上海史、上海志,史是记述它的过去,志是分载它的自然和社会诸现象,学高于史、志,是它们的理论升华。上海学要研究上海的沿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状态,这些都是早已分别研究的内容,也是正在深入研究的内容,但它们的排列不等于‘上海学’,即使在这基础上的综合,也只是‘上海大观’或‘上海概述’,称不上‘上海学’。上海学应该是从对于上海的分门别类及其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中,找出它们的联系和内核,由此构成为研究和发展上海这样一种都市型的学理,富有上海的特殊性,又含有都市学的共性。”这个界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没有过时。我们创办《上海学》集刊,当然不是要编“上海大观”或“上海概述”,我们希望以通贯整体的眼光关照、解读和诠释上海,一方面从细节、局部、碎片的研究和分门别类及其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中“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内核”,从而更完整更立体地呈现上海城市的兴起、发展、困顿和转型的历史,呈现上海城市变迁过程中的变与常,以及变中之常和常中之变,呈现上海城

市的外在风景和内在风景,呈现上海的“城市生命”、城市精神、城市气质,以及由这种精神气质化合而成的传奇性魅力;另一方面尝试通过“科际整合”和“视界融合”等手段,放宽和拓展“历史的视界”,在上海研究中,引入区域的视野、国家的视野和全球的视野,即把上海城市变迁放到区域(江南)、国家和全球的整体变迁格局中加以考察,从而更准确更具深度地揭示上海城市变迁的动力机制、约束条件和空间规模,以及上海之于区域、国家和世界的特殊意义,揭示以上海为中心的国际化商业流通网络和知识传播网络的形成、延伸与拓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所累积的巨大的城市能量和无远弗届的吸纳与辐射能力。通过持续的努力,我们希望能上海研究开拓出新的意境,为国际都市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典范。

在当今学界,上海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也是一门内涵和外延极其浩瀚深广的学问。因其方兴未艾,所以可以开拓的研究空间巨大;因其浩瀚深广,所以不是任何一个机构或个人所能穷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上海学应当成为一种共业,一种共同的学术事业,竭诚欢迎海内外上海研究同行和我们一道,致广大,尽精微,合力把这本集刊办好,共同推进这一共业。

目 录

发刊词	周 武	1
-----------	-----	---

特稿

论上海城市转型	周 武	1
上海走向海上:从河运港市到远洋深水港的发展例证	刘石吉	25

圆桌对话

当代上海研究愿景畅想与展望	徐锋华 整理	35
对当代史研究的期望	王家范	35
当代上海学研究的三点希望	沈渭滨	38
构建上海“新海派”	丁凤麟	40
把被淹没、被遗忘的故事展现出来	马长林	41
当代史研究要防止“碎片化”	冯绍霆	42
集中研究与分散研究相结合	许洪新	44
要突出特定时代的特色	戴鞍钢	45

都市人文

仙乐舞宫:老上海一家娱乐企业的简史	马 军	48
民国时期上海对私立学校的管理模式	施扣柱	64
上海摩登时代的消费、市场与文化网络构建	沈 洁	81
学术与工商的聚合和疏离 ——中国数学会在上海	张 剑	105

当代聚焦

文化的疏离与文化的融合

- 徐诤、刘以鬯比较研究……………陈 同 136
- “西式中国风”的大众化
- 日本游客的上海印象变化和上海的
旅游城市化……………〔日〕岩间一弘 186
- 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出版……………李志茗 201

新视界

- 上海外国租界工部局的起源与合法性问题……………叶 斌 219
- “上海中外官绅”与“东南互保”
- 《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笺释及“互保”、
“迎銮”之辨……………戴海斌 225
- 抗战时期上海“虹桥——徐家汇军事区”研究(1937—1940年) ……蒋 杰 255

新史料

- 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录(一)……………周 武 陈来虎 整理 273
- 秉志致刘咸札 38 通……………周桂发 杨家润整理 张剑审校 302

书评

- 重访摩登上海:以情感的方式……………唐小兵 323
- 文化与消费
- 读《中华药商:中国和东南亚的消费文化》……………冯志阳 332
- 以微观研究呈现宏大历史
- 评《高郎桥纪事:近代上海一个棉纺织工业区的
兴起与终结》……………张 剑 347
- 上海公共租界治理:制度及其变迁
- 《上海公共租界城市管理研究》读后……………李志茗 362
- 微观的发现和空间的发明
- 略评《重构文艺机制与文艺范式》……………张兆成 378

论上海城市转型

周 武

观察上海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如本土视角、区域视角、国家视角、全球视角等等,不同的视角各有自己的视域,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把上海城市的发展放到历史视域中动态地加以考察,不难发现上海城市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转型的历史。转型,是理解上海城市变迁的关键所在。纵观开埠以来 170 多年的历史,上海大致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城市转型:第一次以 1843 年开埠为标志,上海从埠际贸易为主的区域性港市转型而为外贸主导的国际性“互市巨埠”;第二次以甲午战争为起点,上海从比较纯粹的商业都市转型为商业与制造业并重的“工商都市”,1949 年以后更进一步转型为新中国的工业基地;第三次以 1978 年改革开放为肇端,上海从功能单一的生产型城市艰难转型为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国际大都市,这次转型还在继续,远未完成。上述三次城市转型,前后相继,每一次都从根本上重塑了上海,再造了上海。

一、从区域性港市到国际性“互市巨埠”

开埠之前的上海,是江南地区一个以国内埠际贸易为主的区域性港市,主要向国内各地尤其是北方输出棉布和棉花,复从北方输入大豆、豆饼和豆油。据估计,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港埠际贸易货值总计约在 4 840 万两左右。不过,此时的上海主要是作为苏州的转运港而存在。明清时代的苏州不但是江南的中心城市,而且是整个帝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同长江航道以及大运河航道的物流联系,大体是通过苏州完成的,即上海先通过内河航道连通苏州,然后在苏州经运河而达长江。上海的水路优势主要体现在海路上,所谓“往来海舶,俱入黄

浦编号”，但上海并非这些货物的终点站，“海外百货俱集，然皆运至吴门发贩，海邑之民，殊无甚利”^①。也就是说，上海开埠之前，苏州是帝国物流运输的终点和起点，海内外的货物先集中到苏州，然后再由苏州散发出去。上海只是苏州的重要转运港，因而被称为“小苏州”，这个称呼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上海在江南城市格局中的位置。且不说经济上富庶繁华、文化上精致优雅的苏州，就是当年府城所在地松江，亦远非彼时的滨海县城上海所能企及。

然而，上海开埠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这种传统的经济格局和城市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上海迅速取代苏州一跃而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罗兹·墨菲曾引吉本在《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灭亡》一书中的著名观点来解释“上海之所以是大城市”的原因：“一座大城市的最重要、最天然的基础，就是附近农村地带要人口稠密、劳动力充沛，这就为粮食给养、工业制造和对外贸易提供物质资源。”在罗兹·墨菲看来，上海成为大城市，“主要是因为它位于世界上幅员可以比得上无论什么地方、土地最肥沃、人口最众多的地区的顶点，即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顶点”^②。其实，吉本和罗兹·墨菲的上述观点并不足以解释上海在近代的崛起，因为上海的地缘禀赋在前近代就已存在，但那时的上海只是江南的上海，江南并没有成为上海的经济腹地。只有到了开埠以后，上海以对外贸易中心口岸的力量重塑江南经济版图和文化版图的时候，江南逐渐成为上海广袤而又丰饶的腹地，上海的地缘禀赋才真正转化成上海的优势^③。

以出口贸易为例，整个 19 世纪，茶叶和蚕丝是中国出口最大宗的两种商品，1867 年这两项占出口总值的 90%，1894 年仍占 50% 以上^④。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在 1892 年度的贸易和商业报告中甚至表示，“在中国向外贸开放后的许多年来，对外国出口的商品几乎只有丝茶两种”^⑤。其中，茶叶长期占据中国出口商品的首位，但是在上海的出口商品中，却一直是蚕丝占据首位。1850 年，蚕丝占上海出口货物的比重为 52%，茶叶为 46%；1860 年，蚕丝为 66%，茶叶为 28%^⑥。英国驻上海领事达文波在 1878 年度上海贸易报告中写道：“1878

① 叶梦珠：《阅世编》卷 3。

②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5 页。

③ 参见周武：《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上海文化》2005 年第 1 期。

④ 李明珠著、徐秀丽译：《近代中国蚕丝业及外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8 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5 页。

⑤ 李必樟译编、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 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83、784 页。

⑥ 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1843—1863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66 页。

年出口商品总值 28 303 976 两,其中 1 800 万两为蚕丝,800 万两为茶叶。”次年,副领事阿连璧在上海贸易报告中直接指出,“蚕丝在中国的出口商品目录上列于第二位,而在上海的出口商品目录上则列于首位”^①。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茶叶为多口岸出口:1881 年,上海出口 62.3 万担,福州出口 66.3 万担,汉口出口 26.8 万担,三大茶埠出口占全国茶出口量的 73%。而茶叶出口的分散,是与茶叶产区的分散紧密联系在一起:浙、皖茶多由上海出口,两湖茶多由汉口出口,武夷茶则由福州出口^②。与茶叶不同,蚕丝的出口几乎都集中在上海。上海领事达文波在 1876 年的贸易报告中写道:“上海市场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致四川和山东两省都运来了大量蚕丝。”当然,上海出口的大部分蚕丝主要还是来自湖州、南浔以及苏浙两省边界其他地区生产的白丝。据上海领事 1878 年的贸易报告,该年生丝出口额计 51 278 担,其中包括了约 2 900 担的汉口黄丝、955 担的烟台黄丝、500 担的宁波丝和 156 担的芜湖丝,其他全部来自湖州、南浔以及苏浙两省边界。在 1879 年的贸易报告中,直接称“上海是湖州、南浔等大产丝区的出口港”,“浙江省比其他任何一省运来的中国商品的数量都要多些,因为产丝区位于该省境内”^③。正因为拥有这些丝茶产地作为腹地,上海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中才始终雄踞首位。据统计,1860—1900 年,上海进出口总值平均占全国一半以上,1864 年占 57%,1900 年占 55%,其中进口通常占六成以上^④。

紧邻江南丝茶产地,同时又具有比其他口岸更便捷畅达的水路交通网络,这是开埠后上海能够成为对外贸易中心口岸最重要的地缘优势。这一点,若与宁波做一对比,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宁波与上海同属江南,又几乎同时开埠,但是宁波的近代发展相对上海而言不免相形见绌,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丝茶等货物运至宁波远没有运至上海方便。曾长期在中国海关工作的马士观察到:“事实上这里(指宁波)是没有对外贸易的;浙江的丝,不管政治区域上的疆界,总是采取方便的水路运往上海这个丝的天然市场。茶经过山区到宁波后,仍然留在中国人手里,外国人只能在它运到上海后并

① 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 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 464、540 页。

②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第 227、233、287 页。

③ 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 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 416、496、497、540、546 页。

④ 参见周武:《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上海文化》2005 年第 1 期。